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一辑

我的经历见闻

70792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一辑

我的经历见闻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53875

我的经历见闻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附属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6.25 字数160千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印数 1—5000

目 录

绥远政坛见闻琐记……………屠义源（1）

貽谷放垦见闻

民国初年的匪患烟毒

蔡成勋之“德政”

马福祥父子在绥琐闻

冯玉祥励精图治

绥远最软弱的都统——商震

傅作义整顿吏治

世远堂旧话……………赵国鼎口述 刘映元整理（35）

一、我的家庭与当时社会情况

二、读书与教书生涯

三、踏上绥远的政治舞台

四、参加抗战到“九·一九”起义

我的经历见闻……………达瓦敖斯尔（104）

一个蒙古族少年的经历

在沈阳的见闻

北平五年

陷身伪满十二年

从“八·一五”到“五·一”

“五·一”大会前后

东蒙要事杂忆……………那木海扎布（186）

一、郭前旗驱逐外旗蒙民住户事件

二、陶克陶事件

三、乌泰王的变乱

四、珠宝商万成号逼债放荒的闹剧

五、白云梯派与王公代表团之争

六、张学良屯垦和郭道甫叛乱

七、调解包启文与包悦廷的纷争

绥远政坛见闻琐记

屠义源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才22岁，即由湖北来到山西雁门关外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旧城东北五里许还有一个新城，叫绥远城，两城中间荒无人烟。新城因是驻防重地，一般人也不敢来往，所以呈现着路途人稀、一片荒凉的景象。旧城南南街仅有一些小铺，其中稍大的几家买卖，都注意做蒙古生意，如大盛魁是最著名者。因为蒙地交通闭塞，蒙族人民容易被蒙蔽，听说当时一盒洋火就可换回一只羊，其利益之大，概可想见。当时归化城属山西省管辖，驻有归绥兵备道。我到归化城时，道台正是胡孚宸（号公度，湖北武昌人），道台所辖口外七厅，汉民统归其治理。厅署号称抚民理事府，即行政、司法统归管理的意思。七厅为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绥远城还设有驻防将军，那时将军名贻谷，满洲人，所辖乌伊两盟13旗。

我因被清水河抚民同知吴书麟聘充教席，路过归化转清水河的。不久，奉命筹办清水河两所小学堂，以我任堂长。不及二年，又奉归绥道令我充归绥中学堂检察官。又二年，丁忧回湖北孝感原籍，办理亲人事毕，复回山西，投考山西同蒲铁路学堂，毕业后，到同蒲铁路榆次桥工实习。不久参加了山西的辛亥革命，中经多次挫折，阎锡山遁赴绥远包头，我又返回湖北办理实业。不久，阎锡山回太原，又召我回晋，自是混入政界，连署山西襄陵、榆次两县知事。民国4年（1915年）参加第四届知事考试，考取

后又分回绥远。我来报到时，绥远都统是潘榘楹，道尹张远伯，财政厅长刘瞻汉，分别谒见后，即发表我为五原东南清源局局长，自是长期在绥工作，绥远就成了我的老家。解放前40余年中，我所经过的长官，就有18名之多。如从清光绪三十二年算起，有贻谷、埜岫、张绍曾等将军，潘榘楹、蔡成勋、蒋雁行、马福祥、李鸣钟、蒋鸿遇、宋哲元、商震、汲金纯、徐永昌等都统或代理都统，李培基、傅作义、董其武等主席，还有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对这些长官，除我不在绥，未能言其政治概况外，兹仅就曾经共事的长官见闻所及，各提数事，虽非全豹，可见一斑。唯年湮代远，记忆未尽恰当之处，尚望知者指正。

贻谷放垦见闻

贻谷是于庚子年（1900年）之后来绥任垦务大臣的，并曾兼任绥远将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参递解归京。据说，当年绥远当局奉到钦差垦务大臣贻谷即将来绥之谕，就赶紧筹备接差。贻谷来后，本应住在新城衙门（即从前省政府旧址）。这里房屋整齐，条件甚好，可他偏说有鬼，放着不住，反在旧城另行筹设行辕，大兴土木，昼夜赶工，可怜各行各业，无偿供应。他尤有一种恶习，旧的东西全不要，都要治办新的，床铺桌椅，都在百份以上，至于陈设一切，张灯结彩，无不大事铺张，经手官吏还要从中揩油。我有一本家屠忠实，任侯补典史，也是当时筹备官员之一，据他亲口告诉我说，此次接差筹备可算十全十美，谈到其中一事，真令人又气又恨。这些筹备官员的太太们出恭擦屁股用的东西，也是红缎子卷筒，其豪华浪费，概可想见。

钦差莅任之日，照例满城文武，齐至旧城西关外迎接，举行仪式。先接圣旨，即先问皇上圣安之意，然后再接钦差，迎至行辕，自钦差以下同来大小官吏，不知究有多少，一时车水马龙，好不威武。自是各蒙旗王公，纷纷前来参见，请示放垦机宜，接

洽完毕，各自返回蒙旗，听候大放。我有一位本家屠义矩，号根梅，署理萨拉齐抚民同知。我因归绥中学年假去到萨拉齐衙门作客，几乎无日不见到来往的放垦委员，地方官总要照例备酒席迎送，结果都说菜可以，酒不好，因为没有给他们喝南绍，于是都在上级面前说坏话。年终考绩，给屠义矩加上“识谄才庸”的考语参官了。那时官场专讲应酬，你要不会应酬，就莫想作官。当时我还在教育界，尚不深知此中滋味，只是愤慨而已。

放垦委员中，尤以绳丈委员最为发财，视购地者贿赂的多少，为丈地出入的大小。委员每到一地，地方官首先预备公馆，酒肉款待，白吃白喝，自不必说，还要公开奉送银两支票。丈地以顷为单位（一顷100亩），每购一顷，可能多出三成五成，甚至七成八成，真是委员的天下，可以为所欲为。

坐在行辕的总办、会办，以及稍有地位的官员，不用说话，自有放垦委员挑选最好的土地奉送200顷、300顷，甚至更多一点，都有事实可查，人名地名太多，实在记不清楚，如到后套一打听，都是从前某官转移过来的土地。有一行辕文案总办李斌，在临河就有土地300多顷。李斌是炮兵团长李载千的本家，这地就由李载千经管。他在临河种地，常为争水打官司。提起他来，当地没有不怨恨的。我同李载千是同乡，对这些情况才有所了解。包头垦务局局长马家骧，号笠樵，东北人，他在五原有地300多顷。我在包头清源局工作时与他结识。彼此过从久了，有一次，他谈起这些土地的事，一时因无人照管，找了一位名叫孙育材的代为管理。他曾划出10余顷土地作为与孙育材合作造林的基地，后来他又派梅受丞去专门管理。这些土地每年招垦的租子，就不在少数，最后他回了关东老家，把整个土地卖了很多钱。可见那时放垦确是弊病多端，难怪闹得京师满城风雨。

贻谷虽以放垦为主，还兼绥远城将军，兼管驻防旗兵事务。那时满洲旗兵驻防制度，世袭罔替，每生一子，即补充兵额，渐渐老的老，小的小，虽号称八旗，实际兵亦不多，也无所谓操练，坐

吃额饷，无所事事。放鹰玩鸟，颇极盛一时。所有官员子弟更是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这一切，都表明清朝气数已尽，行将灭亡。贻谷任内，也曾大加整顿，但大的方面未加注意，斤斤计较于细微末节，尤其在兵饷方面，择人包揽，对于生活资料，统由他统购统销。那时经手的人，层层剥削，闹的官兵大为不满，统归贻谷一人受过，这也是贻谷被撤的又一原因。

这种种劣迹，屡经地方申报贻谷，未加注意。及闻京师参奏，乃知不妙。军机大臣鹿传霖奉上谕查办，不久即到绥远，同来的有樊增祥，号云门，湖北人。钦差大臣行辕即驻在道台衙门，查办了将近两个月之久，参奏稿听说是由樊云门主写的。樊的文字以尖锐泼辣著称，参稿写得详尽真实。奏稿到京未久，即奉上谕由鹿传霖将贻谷押解来京，说的厉害，其实贻谷还是坐绿呢大轿子走的，不过轿杆上挂了一根练绳而已。这就够惨的了。但当时舆论，都说贻谷是一个善书能文的人，只因坐在行辕，不出大门一步，放任手下官吏为所欲为，闭聪塞明，代人受过，可为殷鉴，以后判罪结果如何，这里就不多说了。

官场黑幕种种

当时口外七厅的首官，皆由山西省城直接委派，归绥道只负监督之责。所谓监督，亦无具体的规定，照例是萧规曹随，无所事事。这些官吏所最关心的只是缺分的肥瘦，收入的多少。每县有陋规几种，如例规、书规、年规等等，不用催科可以坐享其成。每一新官上任，分实授、署任、代理三等，得银：实授1000两，署任是700两，代理就是500两。只要新官一到任，当地钱行、当行等不用说话，就纷纷如数奉送前来。所以每一新官到任，就有票行跟随，名曰“带驮子”，就是要把新官上任所收的“例规”，马上可以驮回去。还有许多例规，多如牛毛，不能一一列举。连侍奉首官的下人亦有许多好处。为首官饮食，每天应交厨房多少鱼

钩海味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厨房头从中渔利，自不待言。我在萨县见过一个厨子头，就有两个老婆，冬天她们穿的都是缎面狐皮袍袄，如此阔绰，其它可知。那时，衙门都有三班六房。三班即马班、步班、快班，每班都有总班头，总头之下，视县之大小有十数或数十人。只要在某班挂上名字，就名曰“住衙门的”。住了衙门，虽无正式工资，却是不愁吃喝穿戴。至若总头家资更多，享受阔绰。钱从何来？还不是来自小民身上！官府首要任务是“催科”。“催科”照例要“比卯”（即打板子）。每逢一个卯期（至少一月一次），班头即派挨打板子的，总要打得见了血，才好到乡下向人民要板子钱。这是向例，衙役持有衙门的差票；下乡，要吃要喝，当然支应，临走还要草鞋钱，愈多愈好，也是照例的。如果轮上一票，就是“住衙门的”发财的机会。六房即吏、户、礼、工、刑、兵六科；各科分担本科的文卷。历任首官离不开他们。当地士绅们走衙门，非同他们勾结不可。所以各房科的人员都是有钱的，尤以户房为最富有。因为户房是管钱粮的，到了钱粮扫尾之时，户房就全数代为垫交，以后再向人民索还，私派衙役下乡讨账，那就不止一倍两倍了。当时民间有一句谚语：“完了粮，自在王”。可见完不了粮就不能自在了。还有衙门的门房（即传达室）的所谓“大爷”，不论传递什么公事，都要由他经手，士绅要想结交官府，非买通门房大爷不行。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门房大爷表示清廉，明的贿赂不收，行贿者就暗地里把元宝塞在这位大爷的被窝里，等到他晚上睡觉自然就发现了，彼此心里明白，后来说话就好办了。可见钱能通神一语，确非虚传。当时作官的，除要钱催科以外，实在没有多少其它政务了。

归绥道号称兵备道，其实只有巡防队十营，由一位谭勇发统领管带。谭系湖南人，兵中亦以三湘子弟居多。每营不过百人，多系便衣，无所谓军装，每营虽有几枝毛瑟枪，经常不操不练，多半连枪栓也拉不开。口外地方辽阔，至少50里或200里设一卡，每卡不过

一人，很少有二人的。我曾路过一卡，亲眼见过卡内墙上挂有一枝破枪，打听巡防队何在，谁也不知去向。巡防队的月饷，大约是每月三两二钱银子，但从未听说正式发过，或者到了当官的腰包了亦未可知，当兵的对此也满不在乎。他们走到哪里，自有好的吃喝。人民也习以为常，只要当兵的不欺负他们，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如果是个官，不论大小，到了某处，全村就要忙个不停，先腾出好的上房作公馆，又派许多村民支差，杀猪宰羊，好不威风！那时这些湖南子弟兵，多半在后套占有土地，安家定居的不少。谭统领在后套就有好地几十顷，后来他死了，他的孙子谭震寰来到后套经理该地，他来见我认乡亲，我才知道这么一回事。不久谭震寰卖了土地回湖南去了。还有一位谭营长号觉卿，是谭统领的本家，他在五原有地20来顷，并在五原成了家，与我胞兄屠义精交往甚好。口外地广人稀，那时地方也比较安静，很少听说有偷盗抢劫之事。

军政费用，全仗山西协饷开支。记得我初次来绥时，即随解饷之车而来。行至山西吴家窑，中间有一个山沟，名石匣沟，长约10余里，有时天色晴朗，就忽然来了山水。那一天，天色有些不好，我们听了当地人的劝告，停车未走，而解饷委员满不在乎，催车走去，行至石匣沟中，果然冲来山水，将10万协饷全数冲去，人仅逃出。后来这个委员连同山西藩台都受了处分。各厅财政收入，多不靠正规，而靠陋规。评价七厅的优劣，也以陋规的多少为断。丰镇、萨拉齐为头等缺，同知在任一二年，至少可得银四五万两。在萨县我曾亲自观察，就以煤炭一项来说，除衙内烧用外，还能折收银3000多两，其它生活资料无一样没有陋规的。那时，包头归萨县管辖，每年春秋二季，萨县厅署官员必到包头换季一次，绸缎布匹，任其选择，每人都要满载而归。各种税务，全由县包收，如一税可收3000元，上解数额最多不过300元，所余的就肥了这些官吏了。田房税契，多在每任交卸之际，减成大收特收，因为额解不多，县官可以趁机捞一把，人民也乐得少交一点。

这也可说彼此两利吧！

口外风气闭塞，文教落后。那时我到清水河，胡道台面囑前去好好筹备设立一个小学堂。我到清水河之初，一见山城小邑，经费无着，即与吴书麟同知商筹办法，因陋就简，把邑中关帝庙两廊十殿，修改讲堂两座，当时地方人士迷信甚深，竟谓我胆大妄为，定要遭到神谴，幸而无事，他们亦敢怒而不敢言。旋即由吴同知聘请两位教员，一是康育民，河北人；一是吴棣华，即吴同知的长子，并请道台委我为堂长。开学需要教科书，那时到处买不到现成的课本，即由我现编写，然后雇人抄写，一面由各教员编写，其余教室、黑板、桌凳，也都筹备就绪，即招收学生。不料原在几个私塾读书的学生，一时闻讯，竟逃避一空，都不入洋学堂，可见当时风气的闭塞。没奈何，乃由我亲身沿门劝告。这里我要插叙一段佳话：当我劝至李士林家时，他的母亲双膝跪在我的面前，嚎啕痛哭，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将来学好了到了外国，我可怎么办呀。”我说，将来如果真到了外国，你就知道好处了。自是李士林到了学校，常考第一，以后果然留学法国15年，得了博士学位。当其回国后立即来见我，两眼泪汪汪，半晌才说出话来，一再说当时多亏我的教育，真是感激涕零。李士林是我国现在数一数二的地质专家，特附书在此，以明当时办学的艰难。清水河小学堂办的稍有起色，胡道台又调我到归绥中学堂担任检查官。那时检查官即相当现在训导的职务。胡道台对此中学非常重视，每逢星期日，必朝服衣冠，来到学校亲自出题考试。又从浙江聘请俞子俊、周和甫来绥担任理化教员。这二位都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好教员。那时学生不肯上学，又多方设法鼓励学生求学，每人每月发给津贴银六两，这才使学生日多。中学还附设了一速成师范班，待遇尤优，每人每月给津贴银八两，半年毕业，分配到各县办理学校，不数年果然风气日开，人材辈出，这不能不归功于胡道台提倡教育之力。

那时后套几无人烟，河北顺德人王同春，前来开渠种地，

大发其财，几乎垄断了后套黄河水利。谁要不买他的帐，就把这些人的辫子连起来，一串一串地往黄河里送，无人敢说一句话。他的伙房有很大一铺炕。可以睡百人，替他种地的究竟有多少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来往过路的人，可以进去吃饭、睡觉，无人过问。好处是方便过往行人，坏处是藏垢纳污。为时不久，因风声太大，当局屡次派人拿办。但每一次去人，不谈拿办还可以，送你很多盘川；一说拿办，就请你下黄河。自是持差票拿办的衙役，摸清了王同春的脾气，多方逢迎，总是满载而归。久而久之，养痍遗患，后套就成了土匪窝了。后来王同春死了，他的儿子王英就成了土匪头，屡剿屡抚。后来王英带他的一群土匪投降了日本，可把地方人民害苦了。

民国初年的匪患烟毒

民国元年（1912年），改归绥兵备道为归绥观察使。民国2年（1913年），绥远改为特别行政区，裁归绥观察使，置民政、军政两厅，以绥远城将军为行政长官，始与山西划分为二。民国3年（1914年），将军改为都统，增设道尹、土默特总管，又设立了审判处，烟酒公卖局，塞北关等机构。民国4年（1915年）设垦务总局。以上三年多，因我不在绥远，所有政治变迁，不得其详。今只就我二次来绥以后的情况，约略言之。我是1915年8月第二次分发绥远的。那时正是潘榘楹都统在任，适值袁世凯整顿吏治，雷厉风行之时，京兆尹王治馨贪污500元即行枪毙，一时轰动全国，绥远闻风，自是更加警惕。我以考取知事到区，见了道尹张远伯，即欲委我到托县整顿吏治。及见财政厅长刘瞻汉又欲委我到清源局整顿税务，使我当时无所适从。自是厅道会商，最后决定委我为五原东南清源局局长。清源局是特区重要税收机关，每县都设有清源局，又因五原地方辽阔，还设有西北清

源局，每局都附设有土药罚款稽核所。清源局以收皮毛税为大宗。稽核所之设立，原因是甘肃多年种大烟，存土多由包头转运，我区经费困难，正好收些罚款，以资挹注。五原西北清源局设在五原县城，五原东南清源局，前任局长办了一年半，亦无正式局址。我接事后，即将局址设在五原东南乡南柜窑子村，在黄河边老昭君坟附近。设局未久，土匪四起，我局即遭第一次抢劫。那一天我局人员正在开饭，忽报土匪即将来村，我同局员急忙藏匿于村民家中。土匪非常狡猾，故意不动声色，拿了少数现钱，即速扬长而去。我局人员上房，望见土匪已经过了黄河，即速回局清理票账、重要文件，以及各人物品。收拾停当，连夜回包。果然次早拂晓，土匪又来抢局，拷问看守局门的村民，逼问局员究竟藏在何处，沿村搜查，终无所获。如果第一次也象这样搜查，我亦不能幸免矣。土匪用意主要是想请“财神”，如果绑上一两个票，就得要三千五千才能回赎，幸而早走了一步，未中土匪的毒计。自是南柜窑子不能设局，乃将局址移至包头西门外五原边界的脑包上，整顿税收，大有起色。诂未及三月，土匪占魁作难，围攻包头40余日，幸有孔庚师长驻守在包，布防得力，虽围攻如此之久，亦未得逞。地方如此紧急，而绥远不发一兵，进行剿办，殊不可解。

追究土匪发生的原因，根本由于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就拿清源局来说，我接任的东南局，前任开办一年又半，既无比较，又无预算，为时如此之久，仅上缴5000余元。我接办一月，就上缴7000余元，第二月就上缴10000余元。那时包头税收机关，不下20余处，多半收款不开税票，开票则大头小尾。至于偷税走私，勾结私放，稽查员的无法无天，更是无奇不有。这里想谈一段奇闻。包头土药（即鸦片）罚款稽核所，因为所长刘仲华系张远伯道尹的舅父，可以为所欲为。所内稽查人员特别多。那时兰州有土客（即贩卖鸦片的客人）来包，即先电报稽核所，所内即派稽查员出外迎接。这一次有一批大宗烟土，稽查认为发财的机会到

了，乃作成圈套，一组出城远处迎接，因土客不熟悉路径，故意绕道，本来应该从西门入包，偏把土客领到东门，这时领路人即隐匿不见。东门卡长问土客从何而来，答曰：从兰州来。卡长说：从兰州来，为何不走西门而走东门？显系希图绕越偷税，立即将人、土扣留，报告所长，所长又立即请示财政厅长，当然回电：重办。所长立即将烟土没收，并将土客管押，听候重办。土客好容易多方贿赂，才被保外候讯。据说这位土客刚死了一个独子，原系借此来包散心的，不料遭此不白之冤，即愤不欲生。一日拿了一把利刀去到稽核所抹脖子。闹了许久，仍将土药充公，仅仅发给土客一些盘费，打发回家了。稽查人员们所以做此伤天害理事，原因在于定章：罚款可以提成一半以为奖励。

包头驻有郑金声一团队伍，原为保障包头以西的安全，乃该郑团长花天酒地，牌桌不离，卢匪始而不过数十人，抢劫为害，每有报告，团长坐在牌桌上说快派兵出城剿办。一会儿，回报土匪已经远遁。过些时，又报包西公忽洞地方聚有卢匪数百人，依然照例派兵往剿，敷衍了事，回报又说肃清了。不多时报告，五原聚卢匪数千人，照例派兵往剿。土匪摸清郑团长习惯，兵来散去，兵去匪聚，地方成了土匪世界。而那些当官的在包头还是照旧吃喝玩乐。那时包镇妓女最多。因有土栈、洋行、毛店，都是有钱的地方。尤其土客栈钱更多，住一夜窑子，就给烟土50两，甚至更多一些。当时土烟每两4元之谱，一夜就是数百元。因此行店、土栈各地方到处都有妓女。这些场所，又是军官们行乐之地。不花钱还要耍厉害，妓女对他们不得不强为欢笑，他们乐以忘忧，天塌下来也不管，卢占魁匪众就越剿越多了。

民国4年（1915年）冬，卢匪围攻包头号称万余人。每日傍晚到天明，枪炮声音不断，那时惟我最难过。因为我们清源局人员，都避回包头，收了10000多现款，放在我的寓中，风声一紧，就有被劫的危险。我战战兢兢，困守40余日。好在城防得力，匪因攻坚不下，乃转向东胜、萨拉齐、托克托三县出发，所向披

靡。东胜、萨拉齐两知事（忘其名）皆弃城逃走，以致地方糜烂，人民受害不轻。托县知事赵振勋系与我同时考取分发来绥的，为了保护人民，挺身而出与匪商谈，给以财物，请勿伤害人民，这种冒险保护人民的县官，在当时实是不可多得的。谁知弃城逃走的知事，反而安然无事，而赵则被参革职了，真是岂有此理。地方土匪乱子越闹越大，京师震动，特派萧良臣率骑兵一旅来绥剿办，追剿数月才把卢占魁匪众赶出绥远境外，消灭过半。

绥远鸦片屡禁屡种，人民习以为常。每年禁者自禁，种者自种，最后总是收些罚款了事。民国初年，袁世凯曾严令禁种，本区当然奉命惟诺，雷厉风行。托克托城向系种烟最多之区，当局特别选任我去托城署理知事。奉委后去见道尹，他说如果禁烟不力，知事即被枪毙。当时我已查明托县种大烟500多顷，我又不能畏难不去。到任之前，我就印好布告10000张，告文是：“偷种大烟，罪名极重。倘敢故违，法无宽纵”16个大字。到任一接印，即先行印贴，一时满城满乡满村，到处贴满布告。人民认为来势甚猛，与历年禁种情形不同。我又随即召集士绅以及乡村负责人等谆谆告诫，真是舌敝唇焦，又亲自分赴各大乡镇轮流讲话，希望他们自动铲除，乃一推再推，还是观望者多。县内原驻有一营军队，还驻有一个支队，队长名叫王占魁，我就同他磋商办法，希望他协同我组织一个督铲队。他看到今年禁烟与往年不同，愿意帮忙。首先令他的官兵把所包庇的或与人合种的大烟自动铲除。人民看到军队也抗不过去，于是大家都自动铲除起来，我因势利导，约同该支队长带领督铲队下乡督铲。远近闻风，不到多久，几乎铲光铲净。这次禁烟的顺利，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正在清理善后，督率农民改种嘉禾之际，即赶上袁世凯登基改为洪宪元年。本区混成旅长王朝烈领衔称臣出奏，极表拥护，一时政局混乱，人心浮动。王朝烈派上他的军队赶到托城禁止铲烟，并且大事提倡复种鸦片，地方人士无一不骂我办事激烈。我经此一气，酿成重病，不得不辞职而去。

蔡成勋之“德政”

蔡成勋原任第一师师长，民国6年（1917年）来绥任都统，仍兼第一师师长。全师官兵移驻绥远，军容浩浩荡荡，颇极一时之盛。蔡都统接任后，都署政务悉由崔顾问（忘其名）主持，还以第一师书记官刘书言兼任总务处处长，所有各机关稍为重要的职务，亦多派第一师军官兼任。军人执政，一时赌风盛行，当时我亦是总务处中一员，也难免不受些影响。自贻谷垦务失败以后，虽然设有垦务总局，但都统从不过问，垦务办理好坏无人稽考。中央任命都统兼任垦务督办，乃在都署西边成立垦务督办公署。当时我仅一人在绥，就住在督办公署后院。所有都署同仁，经常在后院打牌，我还要担任招待，真是苦不堪言。好在都统从不过问。为时未久，我即奉委出任包头清源局去了，这才告一段落。

垦务督办之下，垦务总局设总办一人。第一任总办元恺号虞卿，为时未久，即调为朱荷宜。垦务进行如何，暂且不提，总局成了高级麻将所。都署顾问带头，每日公余之暇，即到垦务总局聚会，照例每日必有红烧翅子。据说每个翅子，须用十只鸭子汤烧成，特别好吃。吃完之后，手弹至半夜而散。每日如此，从未间断。但是蔡成勋从未参加，也没听说他打过牌，也从不过问这些事，究竟在后堂干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地方人民贪图利益，喜种大烟，亦知历任政府禁种大烟，都是那么一回事。蔡成勋到任以后，亦是布告皇皇，严令禁种，如有犯者，定即如何惩办等等。并且三令五申，不惜纸笔，好像煞有介事。谁知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朝下令而夕又派人分赴各县面授机宜。各县知事心知种烟对他们首先有利，何乐而不为？更何况按规定每亩烟地除征收实物若干成外，并收罚款若干成，于是明禁暗纵，鸦片越种越多。结果人民所收的大烟，几乎全部归公。